

为什么说“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 董 彪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不仅被称为法宝，而且被称为“最大”法宝，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判断和理论论断。这是我们党立足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深化对理论创新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

首先，“两个结合”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封闭僵化的体系，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决定了其发展开放性的特征。只有深深扎根于本国的具体实际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9世纪末，恩格斯在讨论美国工人运动的时候，曾就社会主义工人党如何结合美国实际发表了看法，认为这个“移自外域”的党要加速自身的胜利，就“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学习英语”。恩格斯无疑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真谛。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跨越时空的思想伟力，也必须“穿中国服装”“讲中国话”。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在于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在于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其次，“两个结合”是党和人民事业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党始终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科学判断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主要矛盾、发展阶段、战略任务、依靠力量，掌握了改变中国的强大真理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面向未来，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加显著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的重要法宝。

最后，“两个结合”是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法宝。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伴随民族危亡的是对民族振兴的渴望，伴随文明蒙尘的是对文明复兴的追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具有进步思想的仁人志士为了救国救民上下求索、不断探寻真理，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个国家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改变中国，就在于符合近代中国人救亡图存的需要。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对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无情批判以及对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深刻同情，使其在理论上和情感上都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则使中国人认识到，在封建主义旧路和资本主义歧路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社会主义的文明发展道路。正是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击中中国这块古老土地，并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使中国社会重新塑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道德理念、人文精神、教化思想等，使中国人重新铸魂。“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其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造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新征程上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将充分弘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为中华文明注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将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底蕴，并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中重焕荣光。

简言之，“两个结合”是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认识，也是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基本路径。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华北联大文工团团员合影

抗日烽火中的晋察冀文艺

□ 邵文英

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创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党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党的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者以革命文学艺术为有力武器坚持对敌斗争，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等作品，这些文艺作品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歌颂抗日英雄事迹、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激发民众团结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宣传抗战的诗歌多以街头诗的形式出现。街头诗也叫墙头诗，就是把创作的诗歌写在红绿纸上再贴到墙上，有的还配上几笔简单的画。街头诗起源于延安，后传到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边区扎根并得到蓬勃发展。1937年底，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报》）正式创刊，《抗敌报》开辟了文艺副刊《海燕》，成为晋察冀边区的一个重要文艺阵地。《海燕》创刊时就号召晋察冀边区的诗歌工作者写街头诗，开展街头诗运动。在数以万计的晋察冀边区抗战诗歌中，田间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柯仲平的街头诗《杀敌去》、孙犁的街头诗《儿童团长》等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这些宣传抗战的街头诗往往运用民谣的韵律，言简意赅、直抒胸臆，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战斗色彩、饱满的革命热情，形成了明快质朴的风格，深受群众喜爱。当时边区的诗社诗刊众多，如战地社的《诗建设》、铁流社的《诗战线》、新世纪诗社的《新世纪诗歌》以及边区文教会的《边区诗歌》等。抗战街头诗创作的兴起，带动了边区诗歌的创作方向，这些诗刊也都刊登了大量抗战诗歌，形成了宣传抗战的诗坛合力。

除了街头诗，街头小说也是抗战活动的重要宣传形式。街头小说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将创作的小说写在单张纸上再贴到墙上，另外一种则是将小说编入各个乡村、学校、部队、机关的墙报和黑板报，而后的形式最为普遍。街头小说因通俗易懂、情节生动而为广大农民群众所喜爱，故广泛在晋察冀边区的乡村和市镇开展起来，成为抗战文艺传播的重要形式。随着晋察冀边区各界文艺团体的逐渐建立和工作的活跃，文艺工作者深感短小、通俗的街头小说，已不足以反映晋察冀边区的斗争生活，便纷纷进行深度创作，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这一时期，《晋察冀文艺》《战地文艺》《山》《长城》等文艺刊物陆续出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报》以及平西抗日根据地办的《挺进报》、中共冀中区委机关报《冀中导报》等均开辟文艺副刊，孙犁、康濯、萧也牧、丁克辛、王林、柳杞、秦兆阳、管桦等都在这些文艺报刊上发表小说，多方面反映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斗争生活，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鼓舞了人们的抗战热情，坚定了人们的必胜信心，晋察冀边区的小说创作也随之逐步走向成熟。

抗战戏剧在晋察冀边区的兴起缘于边区大批抗战文艺社团的强力推动。1939年1月，西北战区服务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文工团、华北联大文艺部、华北联大文工团等也都来到晋察冀边区，在边区形成了一批生机勃勃的文艺队伍和文艺社团。晋察冀边区也建立了文协、剧协、音协、美协、文联、各级文教会等文艺团体。抗敌剧社、西北战区服务队、华北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群众剧社、尖兵剧社、挺进剧社以及前哨剧社、大众剧社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文艺社团。各剧社有的配合八路军上前线演出，有的在游击区村的地道里演出，有的去敌伪军的“炮楼”前作“政治攻势”演出，还有的每个月在村里演出“村民同乐会”，这些演出在宣传、教育、鼓舞群众团结抗战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战文艺社团的活跃为抗战戏剧创作奠定了基础，晋察冀边区戏剧创作在战火硝烟中越来越蓬勃发展，戏剧作品越来越富有战斗力。1938年3月前后，火线剧社社长王林创作了《活路》《警号》《家贼难防》等剧本，这是晋察冀边区第一批反映抗战题材的戏剧作品。1939年7月，边区

成立剧协，随后一大批戏剧陆续上演，很多村干部参与其中，戏剧演出普及到晋察冀边区的各个村庄，几乎成了群众参加抗敌斗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相关资料统计，当时创作的剧目达500多个。晋察冀边区戏剧的创作主要围绕爱国、抗战等重大主题，通过铁与火的残酷斗争，笔墨酣畅地展现出人民群众忠诚、正义、勇敢、慷慨的崇高品质，如丁里创作的《钢铁与泥土》、王林创作的《小英雄》、胡可创作的《五十个殉难者》等。把英雄人物的模范事迹搬演于舞台，也是晋察冀边区戏剧的一个突出特点，如胡可创作的《戎寇秀》、鲁易创作的《洛唐哥》等。这些戏剧作品生动感人，大多洋溢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晋察冀边区歌曲的创作热潮形成是以1939年4月《歌创造》的创刊为标志，晋察冀边区音乐协会的成立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晋察冀边区音乐工作者同广大军民坚强地战斗、生活在一起，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最为著名的有牧虹作词、卢肃作曲的《团结就是力量》，曹火星创作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方冰作词、周巍峙作曲的《子弟兵进行曲》等。威武雄壮、昂扬嘹亮的抗战歌曲以其激昂的旋律、铿锵有力的节奏、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火炬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些抗战歌曲记录了那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歌颂了英勇无畏的民族大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意志，激励着人们砥砺前行，铸就了中国音乐史上的辉煌篇章。

《道德经》里的修身之道

□ 杨湘峰 高买花

老子所著《道德经》被誉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瑰宝，全文虽只有5000多字，却语言精练、理念幽深、境界高远。《道德经》中蕴藏的修身观念虽历经千年仍散发着独特的智慧光芒，给后人以借鉴和启迪。

以“上善若水”积德蓄德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认为，万物生于道而养于德，德和道都是万物生长的必要条件。道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本原和法则，是事物良性发展所必须遵循的规律，万事万物只有遵循其道，才能够达到“和”的状态。道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自然之理，是万物生长的必然法则；德是指事物自身发展所形成的秩序，是道的具象化，是道的外在表象，是道在事物中的显现。

老子说“上善若水”，最上等的善就像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爱养万物而不做它们的主宰，虚怀处卑，接纳万物的回归；水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处于众人所不愿处的地位，因而接近于道。符合道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就是最高的善，最能体现道的德行的是水，最上等的德行莫过水的德行，

水的特性和作用几乎与道一致。水所体现的德，即不争、处下、柔弱。不争，就是不逞强示能，谦而不骄。处下，就能够容纳一切，而为万物之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柔弱，就能长久生存，就能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是天下至柔之物，水也一样，最柔软的东西，却能驾驭最强硬的东西，所以老子感叹，“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老子将积德蓄德看作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当德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将拥有强大的能力。认为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要学习水谦下自处的风格、宽容大度的胸怀、无私利他的精神、追求柔韧的智慧。

以“少私寡欲”知足常足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认为，祸患再大莫过于不知满足，罪过再大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能够懂得知足的人，必然会感到心满意足，进而经常处于满足的状态。人有祸患凶咎，都因为不知道满足。正因为如此，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

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强调，沉醉于物欲的满足和生理的愉悦对人没有好处，所以应该远离。

“罪莫大于可欲，罪孽再大莫过于无限制的欲望，过多的欲望不仅不能让人真正地得到享受，反而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危害，真正的享受是有理性的节制。

老子告诫人们要遵照“道法自然”的法则生活，“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把“见素抱朴”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把“少私寡欲”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常思贪欲之害，分清欲望当中的“可欲”与“不可欲”，减少、去除各种私心和欲望，尤其是与道、德相悖的各种欲望，不一味追求无限的身外之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足常足、知足常乐。

以“致虚守静”修身修心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致虚极，守静笃”，是《道德经》修身之道的基基本主张，是老子告诉世人的一种最根本的修身养性心法，是调养自我内心、使之与道合一的主要方法。老子提倡首先要“致虚极”，即主张人要力图达到一种极致“虚空”的状态，也就是说让人的内心保持在一种接近无欲望牵绊的状态，然

后“守静笃”，才可使人笃守安静、清静的内心世界。

老子对于“虚”和“静”的提倡，归根结底源自道。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无形无象的，这符合“虚”的本意。“静”是直接老子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相联系的，即“无为”，“静”就是“无为”、顺应自然的重要表现。因此，可以说“致虚极”和“守静笃”就是道对人的行为所作出的基本要求。

能让内心保持宁静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才能产生“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智慧。“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一个人心浮气躁时，方寸已乱，必然会导致举止无度、进退无据，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反之，心静神定，泰然自若，便不受外界的喧嚣和嘈杂干扰，就会从容应对万事。每临大事而有静气，方为大家风范。

老子强调，自我修养首先要从“心”出发，在恪守“虚”和“静”上下功夫，从容应对世间纷繁复杂万事万物，最终实现身心双修的理想状态。

